

薛銜天 金东吉 著

(1917-1949)

民國時期
中蘇關係史

(中)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基金资助，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出版基金资助

(1917-1949)

民國時期 中蘇關係史

薛衍天 金东吉 著

(中)

中共党史出版社

前 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中国抗日战争完整的历史阶段。事变爆发后中苏关系迅速改善,1932年中苏复交,到1945年8月14日中苏订立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时期也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德国建立反苏反共同盟,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既是中国的敌国,也是苏联的敌国,应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这一历史阶段中苏关系的主要内容。中国是弱国,在整个抗战期间争取国际援助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中苏复交之日起,国民政府就极力争取苏联直接对日本参战,建立中苏抗日同盟,共同战胜日本。在整个抗战前期中国始终将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列为整个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只是到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之后,才将建立战略同盟的目光转向美国。苏联是强国,但同时面对来自德日两方面的威胁,分化德日同盟,中立德国和日本,至少避免德日同时进攻自己,是苏联外交的重中之重。苏联对华政策从属于苏联的对德日政策,而不是相反。中苏彼此战略要求的不同,决定中苏在对日关系上只能结成一定程度的、而且是不巩固的同盟。因此在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达到中立日本的目的之后,苏联就停止了对华援助。恰在此时,在新疆问题上中苏之间发生了龃龉,国民政府迅速与美国建立起战略同盟,将对苏关系降到次要地位。以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为界限,抗战期间的中苏关系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4月2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为前期,该约签订后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后期。

前期。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占领东三省。蒋介石集中兵力“围剿”红军;不抵抗日本;谋求东北问题通过国际外交解决。但美英大国家和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绥靖政策,蒋介石外交解决东北问题无望,转而谋求改善对苏关系,争取得到近邻苏联的援助。“满洲国”成立后,中国与苏联远东地区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者已不再是不堪一击的地方军阀,而是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和伪满当局不仅将苏联政治经济势力全部逐出东北,而且向外蒙古渗透侵略势力,直接威胁苏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联先是谋求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东北等问题上向日本让步,但被日本拒绝。这种严峻形势迫使斯大林做出新的对华战略抉择:一、放弃十年内战期间通过共产国际支持中共推进苏维埃运动的方针,转而谋求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二、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向国民政府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使中国军队能拖住日本,以保证苏联东线的安全。苏联这一战略转变也完全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受到国共两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衷心欢迎。

从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的发表,中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谈判,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共施加了重要影响。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则通过驻华大使馆直接与国民政府谈判,许诺给予军事援助,订立互助条约,要求国民党放弃反共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当时,曾给予国民政府很大军事支持的德国,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撤销了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支持。苏联成为当时唯一能支援中国抗日的国家。苏联对国民政府停止内战的要求实际上就是给予军事援助的条件。1937年7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首次向苏联提出缔结中苏互助条约的要求。蒋介石要与苏联结盟、取得苏联的援助就不能不考虑对中共转变政策。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合作迅速成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宣告成功,形成了中国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对这一新局面的形成,苏联起到了重要影响。本书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苏联如何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分别对国民政府和中共施加影响,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过程。

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心转移到国民政府

方面。苏联与中共的联系只保持在不影响整个国家关系允许的水平。事实上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转变策略的过程中、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合作谈判的过程中要求中共无条件地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用王明的话说,只要不在肉体上消灭红军,什么合作条件中共都要接受。但中共吸收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血的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吸纳了共产国际的正确建议,保持住党对红军的指挥权和对边区的领导权,从而造就了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发展,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大发展,蒋介石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皖南事变几乎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苏联是当时唯一能对国共双方施加影响的国家,皖南事变发生后,对国民党发出停止军援的警告,这对维护统一战线的存在起了重要作用。本书没有辟出专门章节阐述这一方面的内容,而是将有关内容融入中国对苏战略和苏联对中国抗战援助的有关章节加以论述。维护统一战线的存在,与提供武器支援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维护统一战线的存在是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的优先方面。

几乎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同时,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苏联对华提供三次总值为2.5亿美元的贷款,用以购置苏联飞机、火炮、弹药等武器装备。苏联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参与对日作战筹划、指挥和培训中国官兵的工作;派出志愿飞行队与中国空军一起打击日本空中强盗。先后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有300余人,其中有一些是苏联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斗英雄;志愿飞行员和后勤人员最多时达712人,他们英勇战斗,立下赫赫战功,其中许多人将热血洒向中国的蓝天。上千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还帮助中国修建和维护西北交通线。苏联是当时对华提供援助的唯一国家,这一援助有效地提高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能力,提高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对苏联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刻给予宝贵的援助中国人民矢志不忘。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抗战期间中国对苏联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后大门与后花园的关系。中国浴血抗战有效地拖住了日军,充当了抵御日本进攻苏联后大门的战略屏障,保证了苏联东线的安全。中国提供的钨、锡等战略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国防工业。在整个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始终未能对苏联发动进攻。苏联得以专心致志地应对西线战事,战胜了德国,最后又回过头来打败日本关东军,实现了自己的全部的战略目标。苏联对华战略取得了完全成功。

但是苏联以中国拖住日本的政策服从于苏联中立日本和德国的战略。从九一八事变起,苏联就开始谋求缓和对日关系,对关东军向北满进军、占领哈尔滨等触犯苏联在华核心利益的举动,采取“不干涉政策”,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怂恿了日本的侵略行动。随后苏联承认伪满洲国派往中东铁路的代表为合法代表,接着又向“满洲国”出售中东铁路,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还在捕渔业和能源开采等方面对日本让步,企图以出让这些利益,换取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达到中立日本的目的。但以反共反苏为旗帜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长时间反对订立这一束缚自己侵略苏联手脚的条约,使日苏缔约谈判总是得不到进展。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订立了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离间了德日同盟关系,使西线得到暂时安全。苏联政府趁机加强了东线的军事力量,在诺门坎歼灭日军近两万人^①,粉碎了日本“北进”企图,大大提高了对日谈判地位。随后日本政府确定“南下”战略,加速了与苏联谈判的进程。双方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这一举动,违反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不得与侵略对方国家的第三国签订任何协定的规定,与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订立了“非战条约”,停止执行对华武器供货,承认“满洲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以该约的签订为界限,抗战期间的中苏“蜜月”期宣告结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转入了后期阶段。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谈判过程和条约的签订都紧密地围绕苏联对华政策进行,本书辟出专章加以必要的阐述,以便更清楚地了解苏联的对华战略意图。

后期。《苏日中立条约》疏远了中苏关系;将日本兵锋引向东南亚和太平洋,恶化了日美关系。中美苏关系从而开始重新组合。中苏关系虽然疏远,中国国际环境却得到了改善。因日本的锐意南下,独自

^① 在诺门坎事件中,日军被歼灭的人数苏日记载各不相同。据苏方资料,1939年4—9月之前,苏蒙军队在诺门坎地区共消灭日满军5.2万—5.5万人,1966年日本靖国神社公布的诺门坎阵亡的日军人数为1.8万人。

支撑对日本作战的中国,在美国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战略地位,美国最高当局认识到支持中国就是保卫他们自己。就在《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的两个星期,美国通知中国给予总额为451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援助,中国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得到了这批援助物资。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美英对日宣战,9日中国对日德宣战。中国与苏美英三大国遂成为同盟国。这样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孤立对日作战的纯受援国,转变为与西方大国共同抗击法西斯国家的同盟国,中国军队不仅在自己国土上对日作战,还承当起境外对日作战的重任,得到盟国财政、军火和物资援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为抵抗德国,英国无力东顾,苏联更是自顾不暇,对日本作战主要落在美国身上。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战略考虑:一、在战时依靠中国打击日本;二、在战后依靠中国抗衡苏联向东亚扩张。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谋求与中国建立亲密的特殊关系,除加强对华军事援助之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尽量给予中国应有的地位。在罗斯福的建议下,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苏、英一起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创建联合国发起人之一,从此中国跻身四大国行列。美国在中国的地位迅速地取代了苏联,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苏联。整个对外关系,包括对苏关系在内,蒋介石一心一意地跟着美国走。这样,对抗战后期中苏关系的走向,美国就成为最主要的制导因素。这是抗战后期中国整个对外关系中最重大的变化。

第二大变化是中苏关系迅速变冷。《日苏中立条约》本已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恰恰条约签订两个月后爆发了苏德战争,使苏联处于严重的困境。被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新疆独裁者、政治投机家盛世才乘机与苏联反目成仇,投靠中央政府,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新疆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将苏联在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全部赶走,导致中苏关系日趋恶化。但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重新“返回”新疆,全力支持三区革命推翻蒋介石刚刚组建起来的新疆地方政府。至抗战胜利前夕,在三区革命军的沉重打击下,新疆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已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解决新疆问题的锁钥又抓在苏联的手里。这样,新疆问题就成为制约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是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抗战结束之前,中共拥有近百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解放了1亿以上的人民,组织起近百万的正规军和220多万民兵,成为影响国内局势的重要力量。蒋介石一向认为对苏关系和对共产党的关系是一回事,担心战后苏联支持中共向他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解决中共问题的钥匙就掌握在苏联手里。这样,中共问题就成为蒋介石制定战后对苏政策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是整个抗击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连为一体。抗战前期是中国独立支持抗战局势。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被纳入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作战体系。中国战场成为整个反法西斯战场的一部分,中国必须服从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而当时领导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一个是制导国民政府的美国,一个是制约国民政府的苏联。中国虽跻身四强,但在解决包括中国利益在内的国际问题上并没有多大回旋空间。

抗战后期的中苏关系就是在以上因素制约和影响下发展的。加之1944年中国对日作战极其不力,而日本却取得了重大战果,就当时情况而论,光凭中国自身的力量战胜日本还要经受很长时间的痛苦的战争过程。对日作战的总形势决定,中国只能隐忍地接受《雅尔塔协定》,以牺牲国家领土主权为代价,与苏联签订盟约,换取苏联对日作战。

但必须强调指出,蒋介石之所以接受《雅尔塔协定》,与苏联订约,除考虑对日作战总形势的要求之外,最主要的考虑是中共因素。美国之所以极力制导国民政府与苏联订约,也是考虑到了中共因素。

抗战临近结束之前,重建战后世界体系问题被提上日程。为制衡苏联向中国等东亚地区扩张势力,美国需要一个统一的、相对强大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但如果不能解决中共问题,中国必将发生内战,不惟蒋介石政府将成为一个软弱的政府,而且苏联会支持中共,将势力重新打进中国。罗斯福与蒋介石一样,同样认为只有苏联才是解决中共问题的钥匙,不断探查苏联对国共的真实想法,1944年6月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会见斯大林,谈中国问题。斯大林对他说,中共是冒牌共产党。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驻

华大使，其使命就是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共问题。赫尔利来华履任，特别经过莫斯科，就是为了听取斯大林对中共的看法。斯大林对赫尔利说，无论如何也不应把苏联与中共联系起来，“他们（中共）虽自称共产党，但与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不相称”^①。赫尔利受斯大林谈话的影响，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在国共谈判中打压中共，使谈判毫无进展。由于斯大林多次向美国表明了不支持中共的态度，罗斯福做出决定：让蒋介石满足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提出的利益要求，借以建立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联盟，以换取斯大林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支持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为斡旋中苏结盟谈判，杜鲁门于1945年5月派霍普金斯访苏。斯大林向霍普金斯强调：苏联不会阻挠中国的统一，而且要帮助达到统一；苏军进入东北之后，蒋介石可随时派代表接收政权；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他不相信中共领导人有本事或有能力统一中国。斯大林这番谈话，令美国大喜过望。这样，霍普金斯完全达到了莫斯科之行的目的。他与斯大林商定，在7月1日之前宋子文将被“强拉到莫斯科”与苏联谈判。^②

对中苏莫斯科谈判，不能说蒋介石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没有做出努力。但为了解决中共问题，是他首先放弃了外蒙古。外蒙古独立超出了《雅尔塔协定》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的规定。美国也不认为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就是外蒙古独立。蒋介石并没有根据《雅尔塔协定》与苏联抗争到底。反而，正是他对宋子文提出舍“一北”（外蒙古）保“二北”（新疆和东北）的方针。所谓舍“一北”，就是同意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保“二北”就是要求苏联将新疆领土主权交给国民政府，而不是支持三区革命掌控全新疆；东北的行政主权由国民政府接收，不准中共接收。蒋介石还一再指示宋子文要求苏联做出切实保证，支持国民党统一全中国，实际上是要求中共交出边区政权和军队。斯大林摸透了蒋介石的心理，在支持蒋介石统一、不支持中共问题上满口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于是，在缔约谈判中涉及

① 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203页。

② 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343—344页。

的一系列问题中,首先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倒是宋子文在外蒙古问题上尽到了最后努力。他接到上述蒋介石舍掉外蒙古的指示电之后,没有立即按照电报对苏联松口,又与斯大林进行一轮唇枪舌剑的谈判,力保外蒙古留在中国版图,大驳了斯大林的面子。宋子文对蒋介石放弃外蒙古非常不满,不愿充当失地千里的历史罪人。但对《雅尔塔协定》有解释权的美国不肯出来说话,他又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在下一轮谈判中宋子文一字不变地照读了蒋介石的指示电,外蒙古离祖国而去遂成定局。宋子文无力回天,历史不能苛求他。但对出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不惜失地千里的蒋介石,历史对他决不能宽恕!

还在谈判期间的8月9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在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之前,关东军已被全面击溃。莫斯科已经收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照会。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成签字仪式实际上已经到了1945年8月15日。如果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天作签字日期,那这次订约就毫无意义。于是双方认定,签字日期仍为8月14日。

这样,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纽带,形成了美苏协调、共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也就是美苏共同在中国构筑起来的“雅尔塔体系”。

但美国孜孜以求的大连为自由港、开放中东铁路的目标没有实现,也就是说从罗斯福到杜鲁门对东北向美国门户开放的要求落了空。蒋介石也只是隐忍地接受了条约,对苏联是否真正履行条约忧心忡忡。除了国民党最高领导集团中少数人之外,中国各界对美苏背着中国,先订立《雅尔塔协定》,后诱使中国签订中苏盟约的做法一无所知。当第二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公布之后,中国舆论立刻哗然,纷纷谴责国民政府上当受骗。美国进步人士也谴责美国政府出卖了自己的盟友中国。最主要的是在敌后坚持浴血抗战、创造了辉煌业绩并壮大了自己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竟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的发言权,去听从美蒋的安排。这就使美苏构筑起来的战后中国内外政策的框架失去了重要基石,从而注定了这一框架必然倒塌的命运。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复交 /1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远东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1

第二节 中苏复交 /5

第二章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苏联 /7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7

一、德日威胁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 /7

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与《八一宣言》 /10

三、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中共瓦窑堡会议 /17

四、中苏关系的改善与中共代表团“联蒋抗日”方针的提出 /20

五、共产国际“八一五指示”与中共“逼蒋抗日”政策的确立 /23

第二节 苏联与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33

一、中共进一步实行“逼蒋抗日”政策；蒋介石继续执行“剿共”方针 /33

二、西安事变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对策 /36

三、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调整与苏联 /44

四、国共合作谈判与苏联的立场 /49

五、日本全面侵华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54

六、苏联对华政策重心的转移 /55

第三章 中国联苏抗日战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和争签互助条约 /58

第一节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搁置 /58

第二节 中苏关于“出售中东铁路问题”交涉 /60

第三节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援华贷款协定 /65

一、中苏互助条约谈判的启动与中断 /65

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70

三、苏联对华借款协定与中苏贸易协定 /78

第四节 苏联拒签中苏互助条约 /80

一、争订军事同盟,力促苏联参战 /80

二、争取结成政治同盟,待机拉苏联参战 /85

三、以订立盟约为手段,牵制苏日接近 /100

第四章 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105

第一节 武器支援 /105

第二节 派遣志愿人员参战 /107

一、苏联军事顾问 /108

二、苏联志愿飞行队 /116

第三节 援助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设 /122

第四节 防止国共合作破裂、维护统一战线运转 /126

第五章 《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与影响 /132

第一节 苏日缔结《中立条约》 /132

一、苏联提出缔约的背景 /132

二、日本拒绝缔约与中苏关系改善 /134

三、德日缔结反共同盟与苏美调整对华政策 /138

四、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离间德日 /142

五、日苏两次军事较量与日本同意谈判 /144

六、《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146

第二节 《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及影响 /151

一、损害中国主权的“相互中立” /151

二、中美苏关系开始重新组合 /154

第六章 《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57

第一节 《雅尔塔协定》 /157

一、抗战后期中、美、苏的相互关系 /157

二、《雅尔塔协定》	/179
第二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87
一、美国斡旋中苏会谈，中国接受《雅尔塔协定》	/187
二、中苏缔约谈判第一阶段	/194
三、中苏缔约谈判第二阶段	/212
四、条约和相关协定的内容与评价	/221
第七章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与日本无条件投降	/227
第一节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227
一、苏联对日宣战	/227
二、苏军粉碎日本关东军与占领东北	/232
第二节 日本无条件投降	/237
一、关东军投降	/237
二、日本无条件投降	/240
附录	/242
一、引用文献目录	/242
二、参阅文献目录	/258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复交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远东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国际关系、特别是日苏关系是影响中苏关系发展变化极为重要的因素，反过来，中日关系也直接影响日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十月革命后日本是威胁苏联远东安全最危险的敌人。苏日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在东北地区中、苏、日形成了三角关系，日苏之间的矛盾斗争和互相牵制有利于东北地区的稳定。但中东路事件、特别是在东北发生的中苏边境战争打破了力量平衡，给了日本从中渔利的机会。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东北成为俄国和日本争夺的对象。俄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输给了日本，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据约，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土地、水面的租借权和长春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连同附属一切权利和特权概行让与日本。同年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接受《朴茨茅斯条约》的上述规定，从此日本攫取了沙皇俄国在南满的一切侵华特权，沙俄退踞北满，日俄在东北形成分踞南北满的局面。日本还依据《朴茨茅斯条约》“附约”，援俄国之例在南满铁路设立护路军（守备兵），其人数“一公里不过15名之数，由此数内，日俄两国军司令官可因时酌减，以至少足用为率”。^① 根据“附约”，日本护路军以辽阳、铁岭、公主岭等处为据点在长春（不含）以南的铁路线上作永驻之计，形成了一支凶悍的侵华先遣军。^② 这支部队逐步扩大，连同日本驻旅顺口的部队就发展成日本的关东军。至九

^① 步平等编：《东北国际约章汇释》，哈尔滨，1987，第281页。

^② 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一八事变前后,其人数已达 87122 名。^①十月革命后原俄国护路军被驱除,关东军便成为盘踞南满的唯一外国驻华侵略军。但《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签订后,苏联主导了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在北满铁路沿线发展商贸企业,并派入大批以铁路员工为主的工作人员;沈阳、哈尔滨等处设有苏联总领馆和领事馆,苏联在北满仍然保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尽管东北当局与苏联关系紧张,但日本始终被苏联视为其远东地区最严重的威胁,苏联势力在东北的存在,对日本具有重大牵制作用。但中东路事件、特别是中苏边境战争发生之后,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东北当局与苏联都处于敌对状态,这样日本在南满的势力便失去了原来苏联的制衡,东北处于更加恶劣的国际环境。张学良在强行收复中东铁路时战战兢兢,生怕在对苏关系上失去转圜机会,让日本坐收渔利。但由于在战略决策上的错误,其结果恰恰让日本在东北独自做大,敢于加紧制造九一八事变。

1931 年日本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导致日本阶级矛盾激化,日本军国主义陷入空前困境,各派政治势力开始为日本寻找出路。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集团极力主张实行日本既定侵华政策——“满蒙分离政策”,以挽救日本。1927 年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陆海军首脑和关东军司令官参加的“东方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对华政策纲领》,其根本方针是“对中国本土及满蒙”实行不同的侵略政策,田中宣称,日本对满蒙、特别是东三省“负有特殊的责任”,当日本在该地的地位和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论来自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内部,日本都“将予以保护”。^②这就等于宣布将中国东北分离出去,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与会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对田中表示:“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东北军与苏联的边境战争,不但使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处于国际孤立地位,而且表明东北军不堪一击。日本军方认为时机已到,1931 年 6 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决定约以一年为期,对满洲采取军事行动。^③而关东军更加急不可待,提前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路轨,随后事先埋伏好的日军向东北边防军第 7 旅驻地大本营发起突然攻击;日本关东军反诬中国军警破坏铁路,袭击日军,于 19 日进攻沈阳,张学良命令驻沈

① 《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对于日本非法在铁路沿线驻军之报告——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革命文献》第 34 辑,第 820 页。

②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1 页。

③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 311 页。

阳东北军不予抵抗^①，日军遂占领沈阳、安东、营口、长春、凤凰城等地，迅速占领辽宁。这就是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政府和军部曾一度怕引起与苏联的冲突，命令关东军暂时不对北满采取积极作战行动，不得利用中东路。^②日本外务省还多次试探苏联的态度，并向苏联暗示，日军不向洮儿河—松花江一线进攻。苏联当然不相信日本的鬼话。对日本这个多年的对手，苏联早已对它必将攫取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东北的野心洞若观火。但这时因中东路问题中苏边境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尚未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南京政府还对苏联充满敌意，并没有采取改善对苏关系的重要步骤，特别是南京政府对日军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又发生在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可能对日本采取具有实质性的措施。特别是从1929年之后，苏联确定了对内加紧经济建设，对外缓和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政策，尽量避免与周边国家、特别是强敌日本的冲突。针对苏联援助黑龙江抗日武装的传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Карахан Л. М.)向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宣布，苏联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③。当年11月初，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Литвинов М. М.)重申不干涉政策，并希望日本政府信守诺言，不损害苏联的利益。苏联的这一态度，扫除了日本的顾虑，加快了日军进攻北满的步伐。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同一天日本通知苏联，“日军已奉命不得使中东铁路遭受任何损失”^④。苏联没有对日本进攻北满做出强烈反应。

1932年1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两名日本侨民在军事冲突中被杀为借口，向东京建议派遣两个步兵大队保护侨民。鉴于苏联已经声明采取不干涉政策，日本陆军总部减少了对莫斯科的顾虑^⑤，于1月28日，批准了本庄繁的要求。同一天，日军通报苏联，请求苏联理解日本为了保护在哈尔滨的日本侨民而出兵哈尔滨的苦衷，同时向苏联提出借用长春—哈尔滨铁路运送日军北上的要求。1月2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

①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

② 《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卷7，第268页。

③ [日]白井胜美：《满洲事变》，第112—113页。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380—381页。

④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386页。

⑤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校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拉罕对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广田弘毅明确表示：“中东铁路是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如果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没有异议。”^①1月30日，日军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逼迫中国方面同意日本利用中东铁路。当天晚上，苏联方面铁路局局长命令哈尔滨—长春路段为日军发车。^②关东军遂于1932年2月5日占领了中东铁路枢纽地区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境被日军占领。从关东军提出铁路运兵的要求，中经日苏两国政府函电往还，仅仅用了4天时间。苏联动作如此之快等于对日军侵略行动的纵容！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并未就此止步，于1932年3月9日一手制造了傀儡国——“满洲国”，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1933年3月被日军占领）四省，以及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东蒙各盟从中国分离出去，纳入“满洲国”版图，定“国都”于长春，称长春为“新京”，拉出清朝废帝溥仪当“执政”（后称“皇帝”）。日本多年策划的分离中国满蒙阴谋终于暂时得逞。

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以及秘密和公开协议，日本对“满洲国”取得绝对控制权。关东军司令和日本“大使”成为“满洲国”最高主宰，日本人充任中枢重要机构副职并掌管实权。凡有关内外政策、军事、经济各重要事件，溥仪傀儡集团悉听命于日本主子，关外广大“满蒙”地区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满洲国”的成立更加膨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过溥仪傀儡集团日本统治者可以“合法”地榨取中国满蒙地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日本国力迅速提升。与此相应，日本极端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官集团的影响迅速上升，结束了日本政党政治。日本内阁、军部和关东军之间在侵略中国的做法上的争论迅速统一到“大陆政策”上来，日军侵华矛头从关外直指关内。中国出现空前的民族危机。

“满洲国”的成立，对苏联来说意味着与中国接壤的东段边界变成了“苏日边界”，中东铁路所穿越的土地一变而为“满洲国”的“领土”，经营该路的合作对象国也一变而为“满洲国”（日本）。这一剧变使苏联远东地区局势迅速恶化了。

十月革命后，日本是武装干涉苏联最主要的国家，日军占领苏联远东大片领土，直到1922年10月才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完全撤军，但仍然占领

① 西春彦监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第130页。

② 西春彦监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第72页。